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五一七期 ——
(二〇〇六年八月六日出版)

本期目录 (zk0608a)

【本刊专稿】 文革“全国第一夺”
——山西一·一二夺权概述(下) 余汝信·曾 鸣
【回首文革】 “文革”宣传画 一个时代的“奇葩” 朱富贵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museums.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以纯文本形式投寄 tougao@cnd.org。请在 subject 中标明 CR 字样。

【本刊专稿】

文革“全国第一夺”——山西一·一二夺权概述(下)

• 余汝信·曾 鸣 •

四、夺权经过：1月12日前后

进入1966年，毛泽东对党内高层之间的不同意见愈来愈不能容忍，对国内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愈来愈脱离实际。3月30日，他说：“我历来主张，凡中央机关做坏事，我就号召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5月，他认为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等人的问题是“反党错误”。通过5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对他们罢官夺权，设立专案审查。到了8月29日，毛泽东在他主持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对李富春提出的关于制定中央八个口文革运动的十条意见表示不满：“一条也不要。何必十条？来一个放任自流。有十六条嘛，都不听。让它去搞。”“全国的省委、大市委、中等市委，要垮一批。垮就垮。要准备个别中央局、一部分省委、一部分市委垮台。”〔40〕

鉴于这种认识和估计，毛泽东对山西很重视。山西是老根据地，抗战时期八路军总部、北方局长期驻在山西，基本上没有离开山西。中央和不少省、市、自治区的干部都出自于山西，或者是经过山西这块党和军队的落地地和前进阵地走向全国的。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薄一波、安子文等人都在山西活动过，所以他们被打倒的时候，他们同

山西的关系受到毛泽东的关注，并认为他们与山西有千丝万缕的联系。（41）卫恒是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文培养的典型。文革开始时卫恒被认为是坚决镇压群众的，毛泽东认为卫恒不行。

（42）所以，毛泽东在1966年早些时候就决定了让山西省副省长刘格平（43）到北京，以便了解他的情况和过去受处分的事情。毛泽东对刘格平的印象很深，认为刘格平能掌握全局。还认为刘格平担任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主任时在处理新疆少数民族和四川大小凉山彝族问题上反对王震和李井泉过火的做法，是对的，王震和李井泉是不对的。毛泽东说，山西就让刘格平搞吧，让他把山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起来。（44）同年11月23日，刘格平给毛泽东、林彪、康生写信反映薄一波、安子文等人发表声明出狱，而他本人则如何坚持斗争和北平军人反省院的情况。12月，周恩来、康生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和刘格平谈话。周恩来对刘格平说，毛主席要你站出来，山西省委瘫痪了，你回去找省委的一些同志组织一个小组，把工作管起来，注意要抓紧经济工作，特别是山西的煤炭很重要。（45）当刘格平表示不好办时，周恩来说，不要紧，中央支持你。（46）1967年1月4日，中央文革小组组员王力、关锋受毛泽东委派在北京饭店与刘格平谈话（一说是受江青委派）。他们让刘先谈拒绝出狱的问题和受处分的情况，然后要刘格平回山西去，把革命群众组织联合起来，争取革命领导干部，把山西省革命和生产的大权掌握起来。还说毛泽东表扬了张日清，说省军区党委9个常委（当时山西省军区党委常委实有12人——引者注）只有他1人主张支左，他是少数，可他是正确的。你回去后要取得张日清的支持。（47）

刘格平1967年1月6日由北京回到太原，住进山西省军区招待所。随后开展了紧张的串联活动。经刘贯一（48）介绍，刘格平首先与张日清（49）谈话，策划在山西的夺权事宜。此前，受刘格平委托，刘贯一与张日清联系。刘贯一在省军区招待所与张日清见面时说：“我们都是新四军的老同志，彼此可以随便说说心里话。”他继续说：“山西的领导权基本控制在走资派手里”，“山西的领导干部虽然派系很多，什么太行、太岳、晋西北、晋察冀，但是基本路线上是一致的。”他还向张日清介绍了刘格平的情况，称“刘格平是个老同志，行政三级，1923年加入青年团，1926年入党，长期在白区工作，在北平草岚子监狱关押的时候坚决斗争，不在反共声明上签字。抗日战争和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山东工作。解放后担任过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全国人大民委主任，是受迫害的干部。”刘贯一又说，有几位革命领导干部准备站出来“和群众一起革命”。张日清表示：“你们站出来革命，我支持你们，省军区支持你们”。刘贯一还先后同袁振、何英才（50）、陈守中（51）谈话，动员他们“站出来革命”，他们完全同意。刘贯一、何英才分别找省委书记处郑林、朱卫华和省委常委郭钦安，动员他们“站出来革命”，造反夺权。

当刘贯一、何英才分别向郑林、朱卫华、郭钦安表露要他们三位参加造反夺权的意图时，均遭到拒绝。刘格平、刘贯一试图争取一些省级领导干部造反夺权的活动有的成功，有的失败。但刘格平等人并不泄气，遂于1月8日在省军区招待所开会，研究确定行动部署。据刘贯一回忆：“约一月六日或七日，刘格平同志等返回太原，在未回家的情况下，即直到山西军区客舍找我，他告我，中央已指示他联合一些同志站出来，并组织一领导机构，领导群众运动。我问刘，中央哪位具体领导和你谈的？刘说：‘你不必问这方面的情况’等语，刘接着问我串联的情况，我都如实地向他作了报告。刘指示我通知以上同志，于翌日上午集合到军区客舍开会，由刘传达中央指示。”（52）陈守中说：“1967年1月上旬（五日、六日或七日，记不起来），刘格平从北京返回太原后，在山西省军区招待所曾有一次集会（参加这次集会的有刘格平、张日清、刘贯一、袁振、续纯实（53）和我），会上刘格平说他在北京见到了总理和康老，说中央领导同志授意他负责组织起来，革山西省委的命。在这次集会上议定两个问题：一是写揭发原省委的大字报；二是成立山西省核心小组。省核心小组由四人组成，即刘格平、袁振、刘贯一、陈守中。当时曾反复讨论了张日清参加核心小组的问题，最后议定张日清不参加核心小组，但以顾问身份参加核心小组的活动。”（54）

1月10日，刘格平等人写的题为《请看以卫恒、王谦为首的钻进党内一小撮反党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修正主义分子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罪行》大字报（习惯上称“五人大字报”）出笼，大字报分五个部分：一、抱着彭真的二月提纲不放；二、坚决贯彻执行并进一步发展了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三、纠缠袁振问题使山西文化大革命一错再错；四、玩弄“三干会”继续欺骗、镇压干部和群众；五、省委以卫恒、王谦为首的一小撮人是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罪魁祸首。“五人大字报”指控卫恒、王谦等人的种种“罪行”，写道：“山西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已经不再是再检讨什么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问题了，而是属于钻进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问题了。”结尾套用了《人民日报》、《红旗》杂志1967年元旦社论结束的七个口号并加了“中国共产党万岁”一句。大字报署名是：刘格平、刘贯一、袁振、何英才、陈守中。

五人大字报贴在省委、省人委门前的墙上，并打印成传单上社会上散发，立即引起强烈反应。造反派方面，北京农机学院《全无敌》纵队当天发出《致山西革命干部的一封公开信》，为《五人大字报》叫好，称《五人大字报》“吹响了决战的冲锋号”，鼓动党政机关干部“站出来，冲上去”，“向卫恒反党集团发起总攻击！”山西革命造反兵团散发题为《目前时局和我们的任务》的传单，赞扬刘格平等人“率众造反”是“大气岿然，斗志大振”，并把山西干部队伍分为这一派和那一派，指控山西省委领导人与所谓“黑帮”彭真、薄一波、安子文、陶鲁笏的“黑线”关系。当天晚些时候，中央文革小组组员王力、关锋在北京《红旗》杂志社接见山西造反派代表，称“刘格平是经过考验的干部，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你们要支持刘格平”。

山西省委方面，卫恒、王谦、王大任当时处于时被批判被批斗的状态。他们对在省城发生一些事情并不知晓。只是1月12日卫恒在和省委常委、秘书长史纪言研究写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错误的检讨稿时，史纪言向卫恒谈了刘格平等人写的大字报并问他对这份大字报有什么看法，卫恒称：“这五个人闹，我不怕，好得很！这个大字报我未看到，总之是：事实可以查对，也可批驳。他们总要无中生有的造谣哩！”（55）至于王谦、王大任、赵雨亭等省委领导人对“五人大字报”的看法，未见当时资料，只是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们在有关文章、讲话、报告和文件中，公开表明了对《五人大字报》的声讨和否定。这是后话了。

1967年1月1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向上海市各革命造反团体发出贺电，号召全国人民“学习上海市革命造反派的经验，一致行动起来，打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沿着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前进。”（56）贺电成为山西一·一二夺权和其他地区夺权的催化剂。

1月12日上午，刘格平和刘贯一在省军区招待所研究给上海工总司等革命造反团体发贺电的事宜。下午，刘格平、刘贯一在这里和首都赴晋革命造反大队、北京农机学院《全无敌》纵队、太原工学院永红战斗队等造反组织的负责人，商讨山西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局势与任务，决定当晚在刘格平宿舍召开山西省左派联席会议，研究成立全省统一的造反派组织问题，以山西造反派统一组织的名义给上海工总司等32个组织发贺电，并商讨夺权问题。傍晚，山西左派组织联席会议在刘格平宿舍召开，参加会议的有23个造反组织的负责人和刘格平、张日清、刘贯一、陈守中以及刘志兰。（57）丁磊（58）等人。刘贯一主持会议，刘格平讲话。刘格平说，今天晚上请来大家，是要研究夺权问题。我们认为夺权这个问题已经迫在眉睫，非解决不行。卫恒等人把山西的文化大革命已经引上邪路了，不把他们手中掌握着的党政财文大权夺过来，山西的文化大革命就会夭折。夺权靠一两家造反组织不行，各个组织必须联合起来，组成一个总的组织，这个组织的名称就叫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吧。这个总指挥部既是大夺权的领导机构，又是夺权以后的临时权力机构。今天我们向大家宣布，我们几个人，有贯一同志、张政委、袁振同志、守中同志已经成立了一个山西省党的核心小组，这个核心小组代行省委职权。但我们核心小组每个人都不参加总指挥部，我们核心小组是总指挥部的顾问

机构，我们当你们的顾问。总指挥部采取巴黎公社的选举办法，由你们自己推选领导人，我们几个人作为个人意见，也可以提一些人名，供你们参考。接着刘贯一讲话。他讲了夺权的意义和当时山西的局势。张日清也在会上讲，表态支持总指挥部夺权。（59）

会议本来准备在谈论成立总指挥部和夺权问题之后研究给上海工总司等发支持电的事情，但在会议中间刘志兰给了刘贯一一份《关于省委特务活动及黑二、三线人物名单》的揭发材料，刘贯一当众宣读了这份材料。突然太原十二中红旗战斗队负责人梁振华跑进会场，向与会者出示了从卫恒住宅中抄查出来的所谓“反革命特务罪证”：一、一尊全身的毛泽东石膏像，其前臂断掉（该战斗队在查抄卫恒住宅时摔断的）；二、若干张当时台湾国民党当局向大陆空飘的反共传单（系山西省公安厅从本省收集起来作为敌方动态送省委领导人的）。对此他们却深信不疑，顿时对毛泽东个人迷信的狂热情绪笼罩会场。有几个造反组织的负责人提出：“先把黑省委二、三线人物抓起来，抄他们的家”。这一动议即得到与会者的赞同。他们立即调集各自组织的人员，分头查抄卫恒、王谦、王大任、贾俊、武光汤、赵雨亭、刘开基等省委领导人的住宅，并对太原市委书记处书记赵力之、副省长兼省人委秘书长卫逢祺和赵承亮（省人委办公厅干事，代管省人委党组机要文件）实行控制，限制人身自由。

抄家以后，刘格平继续和各造反团体负责人在他的住宅开会。张日清、刘贯一等人论及“敌人的严重情况”和夺权行动的迫切性。当即经与会者一致同意，决定成立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推定杨承效（60）为总指挥，朱永庚（61）、宋捷（62）、张建国（63）为副总指挥。特别是与会者看到了卫恒的所谓罪证之后，一致要求立即进行夺权。当即制定行动方案。调集了1万余人，由造反组织的负责人带领分两路到太原市府东街山西省委和省人委驻地，新建北路太原市委和市人委驻地进行夺权。张日清命令山西省军区所辖的在省委、省人民委员会担任警卫工作的部队全部撤走。夺权的造反组织如入无人之境，查封办公室的文件档案柜，取走印章。但省委机关干部并不承认这次夺权行动，坚持上班。直至19日，省委办公厅办公室主任等坚持逐日向中共中央和华北局电话汇报。为防不测，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于13日又从其下属组织中调集了5000余人到省委、省人委驻地担任警卫。

13日晚上，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下属各组织的代表1000余人在省委礼堂集会表示坚决支持一·一二夺权。刘格平、张日清、刘贯一、陈守中在会上讲话，表示坚决和造反派站在一起，夺走资派的权。14日，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发出《第一号通告》。《通告》称：“卫恒、王谦、王大任在省委某一楼内建立了一个地下司令部”，“秉承其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的旨意，企图把山西搞成一个在山西进行资本主义复辟的战略根据地。”《通告》宣称：“原山西省委对文化大革命的一切领导权，自即日起由本指挥部接管。为了保卫无产阶级专政，防止反革命政变，我们于元月十二日夜夺了省委、省人委、市委、市人委等党政机关的权和抄了一些坏蛋的家，搜出了大批私藏的枪支、弹药和黑材料，彻底捣毁了卫恒等反党分子的巢穴”。《通告》还要求，一、所有的工人、农民和干部，都要照常上班，牢记毛主席的“抓革命，抓生产”的指示，坚持生产岗位，完成和超额完成生产任务；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凡是反对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文革小组和破坏文化大革命，就是现行反革命，立即由公安部门依法处理；三、勒令山西文革接待站冻结流动资金，停发一切车辆；四、各革命组织要广为宣传上述各条，协助执行。（64）参加该指挥部并在《通告》上署名的25个造反组织是：山西革命工人造反决死纵队、山西革命造反兵团、山西革命工人野战兵团、山西工农商学革命造反总部、山西省红色造反者联盟、山西医卫革命造反总部、山西红色造反联络站太原工学院红旗战斗队、山西红色造反联络站捕猎大队、山西革命干部造反兵团、北航播火兵团、北农机《全无敌》纵队、首都赴晋革命造反大队、山西体育界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团、山西日报革命造反军、山西东风革命造反兵团、太原市小学教师革命造反联络总部、共青团山西省委机关大无畏战斗队、中共太原市委机关红旗战斗队、太原革命造反司令部、晋京革命造反大军、山西反修兵团、山西红色革命造反联盟、山西农民造反兵团、山西“延安”文艺兵团、太机第四野战军。

15日晚，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在太原市迎新街的一个学校召开下属各组织负责人会议。刘格平、刘贯一、袁振、陈守中等人在会上介绍各自的个人简要历史情况及“受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迫害”的情况，再次表态“一定与革命造反派同生死共命运”，企图消除社会上传扬的对他们的种种不利说法，以便进一步取得造反组织的信任。16日，刘格平、刘贯一、袁振、陈守中等人联名向中央及中央文革小组报送了一份关于省委的材料，标题是：《关于卫恒、王谦等人破坏文化大革命的罪行向中央文革小组并中央的报告》，罗列了山西省委领导人进行“反革命阴谋活动的十二大罪状”。称省委“成立了地下黑司令部、设立了黑据点，在组织上准备和安排了应变对策”。还说：“赵雨亭、武光汤、郑林、焦国鼐、刘开基、胡晓琴、史纪言和副部长以上的大多数干部转入地下，正以全部力量向革命群众和革命左派反扑，成为山西广大革命人民的公敌”。

他们在《报告》中称卫恒等人是“美、蒋特务”，“卫恒黑帮和美蒋的关系值得重大怀疑”，“在卫恒家中革命群众抄出了暗藏的蒋介石像片和反动传单，像片背面还有反攻大陆的行动纲领”；“在卫恒的亲信副省长卫逢祺家中查出地下室，并在地下室的夹壁墙内洞已挖空，其中放置的东西已转移，此人是否美蒋特务打入党内，确实嫌疑很大，山西省委这一反党集团是否里通外国实属可疑”（实际上，卫逢祺的宿舍是建国前旧政府的一个办公室，所谓的地下室就是原来的防空洞）。他们在《报告》中，还把省委根据华北局的指示，为避免党委和人委工作的全部瘫痪而组织的第二线班子，称之为“省委的特务组织”，并称“特务组织有组长刘贯文（省委办公厅办公室主任），组员李玉明（卫恒前秘书），周文（郑林前秘书）等三人”。并把袁平、李文杰、赵承亮、杨奉林、范履端、卜虹云、卢梦等人也都列为“特务情报组织”的成员。他们在《报告》中又称：山西是“刘少奇、邓小平、彭真、薄一波、安子文囚禁革命者，保护反革命的保险柜。是刘、邓、彭、薄、安的战略后方。”他们还煞有介事地编造“卫恒、王谦、王大任在他们后台的指示下，跟踪搜捕革命左派，正加以杀害。自从刘格平五位同志大字报贴出后。这种活动急剧增加，白色恐怖严重，面对这种短兵相接的决战关头，如果不放手发动群众，壮大革命群众力量，直捣敌人的老巢，打断和打乱他们的统治，就可能出大事。”《报告》请求中央批准“对省公安厅、市公安局实行军事接管”。

1月17日，刘格平、张日清、刘贯一以及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总指挥杨承效、红联站负责人杨保明（太原工学院学生，太原工学院红旗战斗总负责人）等人在刘格平宿舍开会，策划接管省、市公安机关。刘格平、张日清、刘贯一在给中央和中央文革的一封电报中说：“山西省公安厅、太原市公安局现在完全掌握在省、市委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手里。已经成为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的御用工具，来反对革命左派队伍。现在革命群众已经包围了公安厅、公安局。我们的意见请中央考虑迅速下令，由山西省军区接管。”会后，红联站立即宣布夺了省公安厅和市公安局的权，张日清到场祝贺，刘格平向中央电话报功。

当日，红联站和首都赴晋革命造反大队宣布夺山西人民广播电台、《山西日报》社、《太原晚报》社以及太原市电讯局的权，并派人抢占了这些单位。

但是，刘格平等人组织的一·一二夺权却引起了强烈反弹。

山西省委领导人的态度。卫恒、王谦、王大任、贾俊一直认为刘格平、张日清、刘贯一、袁振、陈守中策划的这场夺权，不会得到群众的信任，他们表示没有中央的指示绝不把权交给他们。当省委文革办公室请示造反派索要省委印章如何应对时，王大任说：没有中央指示，省委印章不能交出。他们是1月13日晚在太原北营仓库研究修改省委关于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检查稿时，得悉一·一二夺权的消息后作这番表示的。当他们从造反派散发的《海报》中获知要他们15日到五一广场参加批斗大会时，当时表示拒绝参加。可是在见到《海报》落款署

名是省城几个闻名的大造反团体时，他们又决定15日准时到五一广场挨斗。（65）

在15日号称有10万人参加的批斗大会上，卫恒、王谦、王大任、贾俊被造反派批斗，并施行拳打脚踢，坐“喷气式”。造反派的行为引起了一部分人的反对。台下“要文斗，不要武斗”的口号声此起彼伏，大会批判发言不得不中断。还有不少人冲上主席台上与主持大会的杨承效等人辩论，显示了对一·一二夺权的反对和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的蔑视。省委书记处书记郑林听了一·一二夺权的消息后，十分生气，同省委书记处书记朱卫华商量一起去北京向党中央和周恩来反映情况，说明他们是反对夺山西省委的权的。但是省委常委郭钦安则认为，一·一二夺权是有来头的，更何况两位老病人到北京困难重重，恐怕也无济于事，在郭的劝说下郑、朱二人拟议中的北京之行作罢。（66）

15日批判卫恒等人的大会后山西革命造反兵团、太原机械学院第四野战军的负责人趁乱之机率人把卫恒、王谦、王大任、贾俊挟持到上兰村太原机械学院。第二天，机械学院的造反派围攻卫恒。卫恒进行驳斥，并称：刘格平、刘贯一、袁振等人所写的大字报，是政治迫害。他们五个人的底子我们清楚，他们掌权不如我们掌权。现在我还是省委第一书记，要对中央和山西人民负责。你们把我软禁在这里是非法的，赶快放我，我要大摇大摆回省委去办公，可是造反组织成员对他的这番话毫不理睬，坚持要卫恒交出整群众的材料。

1月16日，省委书记处书记赵雨亭在太原新民东街六号给参加省委二线工作的柴守约打电话说：“刘格平、袁振他们夺省委的权，我们不能交权。啥时候中央有了指示让交才能交。”同时，赵雨亭还给各地、市委的负责人打电话说：“省委的电话随时可能中断。如果你们和省委联系不上，就依靠中央的《十六条》，独立思考，独立工作”。并称：“现在的情况和战争时期差不多。在第一线的被冲跨，第二线的要顶上。根据实际情况处理问题。总之，不能影响了工作”。当时，正在盂县主持召开全省计划工作会议的副省长刘开基也在会上说：“刘格平、张日清、袁振等人在太原发动了政变，我是做农村工作的，准备上山打游击”。

对一·一二夺权持怀疑态度的山西红色造反联络站、太原工学院红旗战斗队发表《就目前形势告全省人民书》（简称“一告”），提出“向卫、王、王集团夺权应该怎么夺？谁夺？夺在谁的手里”等一系列问题，表示了对夺权领导人刘格平、刘贯一等人的怀疑。以后，红色造反联络站和太原工学院红旗战斗队又连续发表《再告全省人民书》（简称“两告”），《评总指挥部一号通告》、《二评总指挥部一号通告》、《三评总指挥部一号通告》（简称“三评”），不厌其烦地阐述他们“真正的造反派的观点”。一时间，对一·一二夺权的指责纷涌而至，抨击其为“宫廷政变”、“不是左派夺权”，“没有造反派参加”等。太原工学院红旗战斗队、山西革命工人造反兵团等组织虽然参加了一·一二夺权，但退出了山西革命反总指挥部。

此外，由山西工人联合会，山西红卫兵总部、红卫兵团等组织组成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行动委员会，于1月13日召开了批斗卫恒、王谦、王大任大会。新华社山西分社为此写了消息报道，刊登在1月14日《人民日报》上，以此表示反对一·一二夺权。但红联站、山西革命工人造反兵团认为此举是支持保皇组织，派人到山西分社造反。还派人到北京新华社要求予以更正。陈伯达出面干预，新华社在16日《人民日报》发表“重要更正”，称“在元月十四日有关太原问题的报道中有严重的政治错误，应予撤消。”

然而，不管各方的反映怎样，山西一·一二夺权是得到毛泽东支持的，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反对，它照样要搞下去。1967年1月17日，中央文革小组组员王力、关锋在中南海小礼堂接见红联站、山西汽车工人造反团、山西大学八·一四毛泽东思想先锋队等组织的代表。王力在接见时说：“我们研究了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第一号通告。表示支持山西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坚决向卫恒、王谦、王大任等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接见时，关锋说：

“山西最大的问题就是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夺权”。王力、关锋的讲话迅速被山西驻京的造反派以“特大号外”、“中央来电”等形式传回太原，公布于社会。

1月24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联播节目”中播出了《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第一号通告》，25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山西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的社论。社论称：“在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切关怀和支持下，山西省无产阶级的革命组织和代表们，把省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窃取的种种大权夺回来了！”（67）这篇社论对刘格平们是一个极大的支持。无论此前或此后，《人民日报》为批准夺权或批准成立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而发表的社论中，从未使用过“毛主席支持下”的提法。山西夺权得到这样的“殊荣”，使一·一二夺权的参加者们诚惶诚恐，欢欣鼓舞，有恃无恐，其政治份量不言自明。毛泽东通过《人民日报》社论，表示了对山西一·一二夺权的支持，使山西省委、省人委的干部立即意识到卫恒、王谦、王大任等人问题的严重性。他们中间的不少人，特别是被认为“长期受到卫恒、王谦、王大任等人排斥”的原晋察冀和晋绥干部中的相当一部分人，迅速向刘格平、刘贯一、袁振等人靠拢。在山西干部圈子里流行着这样一句顺口溜：“太行的天下，太岳的党，晋绥干部后娘养，晋察冀干部歇凉凉”。这就是为什么一·一二夺权能够得到部分晋绥、晋察冀干部支持的历史原因。还有受过省委处分的部分干部也表示：“支持刘格平”。这一点在山西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前后后在使用干部问题上得到了充分印证。

但是，对山西省委的领导人来说，这却是灭顶之灾。赵雨亭、刘开基当时正在北京东方饭店等待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小组的接见，以表明他们不同意夺权并请示解决山西省委在文革中的组织问题，周恩来也表示准备接见他们。可是未等周的接见，赵雨亭从《人民日报》上看到报道山西夺权的消息和社论，认为这是党中央的态度，也就不再找周恩来谈了。（68）但赵对此很不理解，不相信夺权是正确行动。很快他和刘开基被造反派押回山西进行批斗并被关押。卫恒、王谦、王大任等领导人更是被作为批斗重点对象，多次被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和其它造反团体组织的大会或小组进行批斗。此前，陶鲁笏也被揪回太原接受造反派的“揭发批判”。这位被毛泽东十分器重的省委第一书记这时也成为“革命对象”，被造反派打倒在地。从12月下旬起，卫恒就被山西革命工人造反决死纵队关押在太原市迎新街一栋楼房里。而省委常委中有人听了广播和看了社论之后，竟然流了眼泪。1967年1月30日，卫恒含冤离开人世，饮恨九泉。不久，王谦、王大任等被投入监狱。与他们有工作往来的一大批工作人员也被打成“特务”、“黑二、三线人物”关进监狱，在押时间有的竟长达两、三年。杨承效这个不是共产党员的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总指挥，竟然在大会上宣布开除卫恒、王谦、王大任等省委领导人的党籍，岂非咄咄怪事。

总指挥部还把对一·一二夺权持不同意见的组织打成“反动组织”、“保皇组织”，其成员中不少也被投进牢房，造成了大批冤、假、错案。一·一二夺权的领导者不但不认为这些行为是对人民群众和广大干部的迫害，恰恰相反他们认为这是保卫“红色政权”必须采取的重要手段。

不仅如此，他们还要发展一·一二夺权的胜利成果。1月18日，刘格平在红联站与山西革命工人造反兵团和首都赴晋的几个造反组织联合成立红色造反总部的筹备会上说：你们可以成立第二指挥部，同总指挥部并肩作战。从此，红联站和山西革命工人造反兵团支持的各下属组织，在省城及各专区、市展开了夺权斗争。除已夺了山西人民广播电台、山西省公安厅、太原市公安局、山西日报社、太原晚报社、太原电信局的权以后，又陆续夺了太原铁路分局、太原钢铁公司、太原纺织厂、太行仪表厂、大众机械厂、共青团山西省委、山西省文化局、山西大学、山西省委党校、太原工学院、山西医学院、山西农学院、山西财经学院、山西矿业学院、太原机械学院、太原重型机械学院等40多个单位的权。并于1967年1月20日，夺了中共大同市委和市人委、中共雁北地委和雁北专署、中共忻县地委和忻县专署、中共阳泉市委和市人委的权；1月25日，夺了中共晋东南地委和晋东南专署的权；1月26日，夺了中共晋

南地委和晋南专署的权；1月31日，夺了中共晋中地委和晋中专署的权。红联站称他们在这些单位和地方的夺权，是“山西一月革命夺权风暴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很快这些专、市的夺权大部分被山西省核心小组和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否定，并进行二次夺权。对各专、市、县、区的夺权我们将另文叙述，这里暂且不谈。

五、山西省革命委员会的成立

1967年1月20日，刘格平、张日清、刘贯一、袁振、陈守中等向中共中央并中央文革小组呈送《关于夺权前后十天工作的报告》。《报告》称，刘格平等人在十天内“主要作了三件工作：（一）一月十日，贴出由刘格平等五位同志署名的揭发省委大字报。（二）十二日夜，组织各革命造反派采取联合行动，向以卫恒、王谦、王大任等为首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进行夺权斗争。占领了省、市委后，又占领了省、市公安机关，（三）十三日晚间，刘格平、刘贯一、陈守中三同志公开站出来在各革命造反派的代表三千余人的大会上表态，坚决和革命造反派群众站在一起，进行夺权。”《报告》还说：“我们决定酝酿和布置‘以保证胜利为中心’的第二个夺权斗争的战役，即省城命脉部门（发电、自来水、铁路交通等）和工农业生产以及政法、财贸、银行等领导机构和五个地委三个市委的夺权（县委作为第三个战役），并在一部分工矿企业进行夺权”。刘格平等人在《报告》中请求中共中央和中央文革在“可能范围内继续给我们以大的精神支援”。

1月20日，张日清以山西省军区第二政委的名义给中央军委写请示报告，反映山西省军区支持左派的情况，并提出军队参加地方文化大革命和支持左派的意见。21日，刘格平给中央文革小组打电话称：“离太原二百华里的地方（具体地点电话上不便讲）发现有二百多人在那里开会，有轿车、吉普车各两辆、伏尔加、联络吉普车各一辆，他们白天不开会，晚上十点以后才开会，早上六点以前散会。他们准备开两个星期，现在已开了四天，据说每人都带有手枪、周围警戒森严，穿的便衣”（实际上是指省委和省人委在孟县召开的全省计划会议）。刘格平还在电话里要求“中央给二十一军打招呼。”江青、陈伯达在刘格平电话报告记录上批示：“联系群众，调查内幕，准备措施，可给二十一军打招呼。”

1月22日，刘格平、刘贯一、袁振、陈守中、何英才等五人联名贴出第二张大字报，标题是：《打倒以卫恒、王谦、王大任为首的钻进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这些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大字报称“山西省委长期以来实行着特务式的统治”。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更大大发展了特务工作”。这张大字报还以传单形式散发到各地。同日，周恩来在各地来京群众代表大会谈到夺权问题时说，山西省的夺权斗争，向我们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指出夺权必须大联合，夺权不是个人主义的争权夺利，也不是小团体主义的争权夺利，必须反对分散主义、各自为政和无政府主义。当天，林彪对张日清1月20日《关于军队参加地方文化大革命支持左派的请示报告》批示：“这个报告很好，值得注意。是否需要回电支持，请全军文革酌定。”25日，中央军委对张日清报告的批语称：山西省军区第二政委张日清同志的报告是一个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好报告，现将林副主席的指示和张日清的报告转发给你们，请引起注意。

1月23日，华北局书记处致电刘格平，对一·一二夺权“表示支持”，并要刘格平与华北局书记处“联系”。

1月25日，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在五一广场召开《革命派大联合夺权誓师大会》。大会由杨承效主持，刘格平、张日清、刘贯一、袁振、陈守中坐镇大会。刘格平在讲话中表示“坚决和革命造反派奋斗在一起，战斗在一起”。张日清代表驻山西的解放军全体指战员宣布：“坚决支持革命群众和革命造反派，如果你们需要部队支持，我们立即派出部队，支持你们，援助你们。”还称：“我们坚决镇压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左派的反革命分子，反革命组织，如果他们动

武，我们坚决进行还击。”26日，省军区和21军指战员在五一广场武装集会，支持一·一二夺权，刘格平、刘贯一、袁振到会讲话。会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武装游行。《山西日报》为此发表题为《敌人不投降就叫他彻底灭亡》的社论。本日，太原工学院红旗战斗队就其发表过的“三评”、“两告”问题，在五一广场“向毛主席请罪”。张日清派出数十辆汽车，满载全副武装的解放军指战员进入太原纺织厂，宣布红联站下属的太纺红卫兵是“反革命组织”，其“夺权是非法的”，并逮捕其成员数十人。同时，又支持该厂另一造反组织红卫兵队重新进行夺权。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宣布红联站夺省广播电台的权是非法夺权，从即日起，省广播电台由总指挥部接管。1月27日，山西省核心小组和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召集原省直机关各部委副部长以上干部开会。刘贯一在会上训斥与会人员说：“如果你们不揭发黑省委的问题，我们就开公审大会审判你们。”刘贯一指胡晓琴说：“我给你指一条出路，就是揭发安子文的罪行。”接着又指着卜虹云说：“你是省委的大特务，必须老老实实交代你们的特务罪行”。

2月1日，刘格平、张日清、袁振、陈守中联名向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山西夺权情况及下一步部署》的报告。《报告》讲到夺权的情况时称：“山西这场伟大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我们不能不站出来了”。“我们在一月十二日晚上召开了二十三个革命组织代表会议，采取了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夺权的联合行动”。“当张日清同志和我们几个同志说明敌人当前的严重情况后，特别是看到了卫恒家中搜出的反动罪证，各革命造反组织的代表群众激愤到了极点，一致要求立即进行夺权。我们同意后他们这一伟大行动并帮助他们制定计划，调集一万名革命群众立即开始行动，这就是一月十二日夜夺权提前举行的原因”。《报告》讲到下一步的部署时称：“一、在所有机关厂矿中放手发动群众并有计划有步骤进行全面夺权。二、抽调大批的工人、革命学生、革命干部经过深入动员后到地、专、市发动群众夺权。三、将地委权夺到后即到县发动群众夺权，准备在二月底以前初步完成全省县以上夺权任务。”

同一天，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发表《第二号通告》，动员全省的造反派“要迅速返回原地，把省城的夺权斗争情况广泛地进行宣传，配合当地革命造反派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展开全面的夺权斗争”。“对假夺权或反夺权的要及时揭露，及时把权夺回来”。《山西日报》为此发表社论称：“《第二号通告》是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全面夺权，彻底夺权的动员令和进军号”，“把革命的烈火燃遍全省，解放全山西”。也就在这一天，刘格平派遣首都赴晋革命造反大队的邢晓光、赵卫东和太原市委红旗战斗队的朗秀梅等三人，到北京向王力、关锋汇报一·一二夺权后的情况，请示成立无产阶级专政委员会的问题。王力、关锋肯定了总指挥部派工作队到各专、市、县夺权的做法和准备在二月底以前完成县以上夺权的意见，对成立无产阶级专政委员会表示十分赞赏，说“这又是一个新生事物”，让很快成立起来，总结经验。2月5日，全国劳动模范陈永贵（69）、李顺达（70）、解悦（71）倡导成立的山西革命造反派联络总站问世，并加入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开创了劳模造反夺权的先例，这在全国是没有的。为此，在太原湖滨会堂举行庆祝大会。刘格平、张日清、陈永贵等出席大会并讲话。刘格平在讲话中说：“在大方向一致的基础上，团结起来、大联合、大造反、大夺权”。张日清在讲话中强调革命群众组织“要加强无产阶级革命纪律，打倒本位主义、小团体主义、分散主义、非组织观点、极端民主化、自由主义、主观主义”。

同日，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宣布成立山西省公、检、法接管委员会，接管省公安厅、省检察院、省高级法院。同时，省军区也宣布对公、检、法进行军事管制。同一天，中共山西省委机关七一公社太行游击队贴出题为《卫恒、王谦、王大任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特务活动》的大字报，同时，印成传单，大量散发。这张大字报有两个附件：一是《原山西省委地下活动已用备用黑据点（太原区）》，二是《山西特务组织系统一览表》。在这份《一览表》中，他们把彭真、薄一波、安子文、李雪峰和陶鲁笏、卫恒、王谦、王大任、武光汤、赵雨亭、贾俊、史纪言、刘开基以及阴发祥、袁平、卜虹云、刘贯文、李玉明、胡晓琴、卢梦、杨奉林、周文、刘建基、欧阳景荣、范履端、柴守约、王文章、赵力之、张琴润、李文杰、郭

庆年、刘子英、赵海旺、孟庆怀、吴行凯、葛宜生、肖里、李景文等38人诬陷为所谓“山西特务组织系统”的头目和成员。

2月7日，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发布《第三号通告》。《通告》称：“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大夺权斗争已经由省城发展到地、市、县。地、市、县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所把持的权力正在被革命造反派夺了过来”。《通告》还称“广大贫下中农站出来，大联合，大造反，同革命干部和一切革命力量相结合，挑起革命、生产两副重担。”2月9日，张日清在《山西日报》上发表题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展开全省全面夺权斗争》署名文章。文章强调：“通过整风要从政治、思想上和组织上整顿我们的队伍，形成一支非常革命化、非常无产阶级化的文化革命大军，夺取新的胜利”。文章最后提出：“在夺权过程中，必须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委员会”，“建立革命人民法庭”。

2月10日，山西省核心小组会议决定增补徐志远、刘志兰、胡炜（陆军21军军长）、陈永贵为组员。2月22日，山西省核心小组会议决定将小组新增加的成员和分工电报中央审批。上报的名单中包括夺权前成立的核心小组5名成员和新补的4人共9人。分工是：组长：刘格平；副组长：张日清；秘书长：刘贯一；副秘书长：刘志兰；组员：刘贯一、袁振、徐志远（72）、陈守中、胡炜（73）、陈永贵、刘志兰。

2月13日，《山西日报》发表《人民日报》通讯员、记者评述山西造反派夺权的文章。文章一开头就称：“山西省革命造反派夺权斗争的重大胜利，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史册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并称它为全国各地“提供了新的经验”，“作出了新的贡献”。文章评述山西夺权经验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实行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实行革命的三结合”；“彻底打碎走资派控制的资产阶级专政机构，建立无产阶级革命的权力机构”；“充分运用革命的权威，开展全面的夺权斗争”。

2月16日，山西核心小组和山西省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召开全省电话会议，张日清在会上称：“卫恒、王谦、王大任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夺权派对党和人民犯了滔天罪行，已成为山西人民的公敌。他们从上到下，有一条黑线，上面以彭真、薄一波、安子文等做他们的后台，下面伸向各地，市、县和各大厂矿、学校有他们的爪牙和帮凶。他们临垮台时，搞了一、二、三道反革命防御线，对抗革命派”。又称：“目前以夺权斗争为中心的全省全面的阶级斗争已经展开，已经由省城发展到地、专、市、县和各机关、厂矿、学校，并取得了重大胜利。”在讲到目前主要任务和干部问题时称：“当前的重要任务就是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大团结，大夺权。”“对干部我们要采取一抓、二罢、三保的方法。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坚决地抓起来，坚决专政；对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不突出政治的，斗争意志衰退的，犯了严重错误不愿改正的分子，要严重斗争他们，但不要过早地处理；对站出来的领导干部，要相信他们，和他们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张日清在讲话中要求，“各地区各单位要根据电话会议精神，研究讨论，安排一下工作，没有夺权的地方和单位，要进行夺权，夺了权的地方和单位要巩固这个权，发展这个权。”

2月19日，刘格平、张日清、刘贯一、袁振在北京向康生、王力、关锋汇报“一·一二”夺权情况。在中央召开的关于山西夺权情况介绍会上刘贯一发言，汇报了以下问题：关于夺权的斗争问题：一、夺权前的工作，二、夺权过程中的工作，三、夺权后的工作；关于实行“三结合”的问题：一、三结合在山西是如何产生的？二、三结合在夺权斗争中所起的重大作用，三、三结合在巩固夺权中继续发挥了它的无比威力。参加这次会议的有周恩来、康生、聂荣臻等人。康生认为山西夺权的经验很好，因而推荐他们到准备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上介绍经验。

2月25日，陈伯达、王力、关锋将经整理成文的张日清一次汇报发言送林彪审阅时写道，

这篇文章“是红旗杂志约张日清同志写的。我们认为很好，拟最近发表，并想建议军委把此文印发军级干部会议参考。”林彪将张日清的文章转呈毛泽东。毛泽东于同月27日10时在陈伯达、王力、关锋的送审稿上批示：“林彪同志：可以登报并广播，军队同志就看到了，不必再印发。如你同意，请退文革小组。”张日清的署名文章发表在1967年2月28日的《人民日报》和3月1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4期上，题目是《坚定不移地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署名张日清。文章称：“山西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斗争的一条重要经验，是实行了革命群众组织、革命领导干部和人民解放军的‘三结合’，在联合夺权的斗争中，解放军起了很重要的作用”。接着又说：“省委内的领导干部站出来同革命派结合的时候，我们便主动地同他们联系，支持他们站出来揭露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并给他们的活动提供方便，同时向革命群众介绍他们的情况，揭露敌人造谣挑拨的阴谋。清除革命群众对革命领导干部的某些怀疑和不信任情绪。这样，就为革命领导干部参加大联合，实现‘三结合’创造了有利条件。”

2月26日，山西核心小组会议决定：一、成立山西省无产阶级专政委员会，由张日清任主任。二、派石珉、许荒田到晋南去联合造反派重新夺中共晋南地委和晋南专署的权。三、对大同矿务局实行军管，派王金贵、郝晋书到大同发动和组织造反派重新夺中共雁北地委以及雁北专署和中共大同市委与市人委的权。山西核心小组和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在太原五一广场召开庆祝无产阶级专政委员会成立大会，大会宣扬山西省无产阶级专政委员会“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生事物，是无产阶级专政史上的创举”。刘格平、刘贯一、袁振等出席了会议，张日清代表省核心小组在会上讲话。他说：无产阶级专政委员会“是山西省无产阶级专政的最高执行机关。它是按巴黎公社的原则产生的，是在斗争中创造出来的，又是由革命群众组织、人民解放军和革命领导干部‘三结合’组成的。”会上还宣读了山西省核心小组《关于成立无产阶级专政委员会的决定》和《山西省无产阶级专政委员会通告》，会后，举行了示威游行。

2月27日，山西省核心小组会议讨论即将成立的山西省革命委员会及其下设的各委员会主任、副主任，办公室主任、副主任名单。2月下旬至3月上旬，奉军委命令驻山西太原等地的陆军第21军移防陕西省；陆军第69军从河北省保定专区移防太原等地并进行三支两军工作。

3月9日，山西省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召开常委会议，决定3月12日至18日在太原召开山西省革命组织代表会议，产生山西临时权力机构——山西省革命委员会。3月12日，山西省革命组织代表会议在湖滨会堂开幕。《山西日报》为此发表题为《我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深入发展的里程碑》的社论。参加这次会议的正式代表3993人，列席代表256人。会议期间，刘格平作《山西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形势和今后任务》的报告；张日清作《普遍深入地开展整风运动，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报告；刘贯一作《关于山西省革命委员会暂行组织条例草案的报告》；袁振作《狠抓革命，猛促生产，坚决夺取革命生产双胜利》的报告。会议通过了《山西省革命委员会暂行组织条例》和山西省革命委员会委员、常委、主任、副主任名单，选举产生了山西省革命委员会。经中共中央批准，刘格平任山西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张日清、刘贯一、袁振、郭永彪（74）、谢振华（75）、焦国鼐（76）、陈永贵任副主任。大会于3月18日结束。

3月19日，在五一广场举行庆祝山西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刘格平在会上讲话，称：“山西省革命委员会的成立，是我省革命人民继‘一·一二’夺权之后的又一个伟大胜利”。刘格平在讲到今后的任务时说：要巩固和发展革命的“三结合”，夺取文化大革命的彻底胜利；要加强无产阶级专政；要抓革命、促生产；要开展整风运动。在会上发言的还有郭永彪、张宗文、杨承效、陈永贵、刘灏。《山西日报》为此发表题为《革命的三结合方针胜利万岁》的社论，祝贺山西省革命委员会诞生。

通过以上的叙述，人们不难看出，刘格平、刘贯一、袁振、何英才、陈守中以及张日清、刘志兰在一·一二夺权前后所起的重要作用。如果没有他们的策划和领导，这次夺权是不会成功的。山西造反组织即使夺了权，毛泽东和中共高层也不会认可。就是说，在山西一·一二“三结合”夺权中，这几位“革命领导干部”和张日清是发挥了关键作用的。

那么，刘格平、刘贯一、袁振、何英才、陈守中为什么要写揭露卫恒、王谦的两份大字报呢？为什么要夺卫恒、王谦、王大任等人的权呢？按说，他们的政治地位很高，革命资历很长。不会像文革初期的红卫兵和造反派那样单纯天真，上面说什么就信什么。但是，恰恰是他们在关键的时刻做出了关键的举措，这一重大举措直接影响了他们以后的政治命运。

笔者以为，刘格平、刘贯一、袁振、何英才、陈守中、刘志兰之所以造反夺权以及张日清支持他们的夺权行动，主要有以下几点原因。

第一，毛泽东的支持。如前所述，早在一·一二夺权前，毛泽东就认为卫恒不行，山西的文革要由刘格平来搞。并且要周恩来、康生、江青、王力、关锋把以上指示传达给刘格平。刘格平1967年1月7日在山西省军区招待所同刘贯一、袁振、陈守中、张日清等人开会时称：奉中央最高领导之命，要把卫恒等人掌握的领导权夺过来。刘贯一称：“我们这次夺权斗争，所以取得胜利，是毛主席给我们的，是中央和中央文革给我们的。”他又称，山西“三结合”夺权这一形式，是在“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亲自指点下”产生的。一·一二夺权后毛泽东又要求中央相关部门予以支持。直至同年8月，毛泽东明确指示69军站在刘格平一边，坚决支持刘格平。并且批示“照办”的中发（67）263号文件，全力支持刘格平、袁振等人。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毛泽东的这种态度是刘格平等人赖以造反夺权的强大支柱。没有这一条，刘格平、刘贯一、袁振、何英才、陈守中、刘志兰和张日清是绝对不会干这种被认为是冒极大风险的事情的。既然最高领袖指示了，就闻风而动坚决照办。这样就有了五人大字报和一·一二夺权以及其他行动。

第二，长时间存在着的山西干部队伍中特别是领导层中的排外情绪，换句话说，就是领导圈子里的山头主义、地方宗派主义，这是文革前山西政治生活中的弊端。但是，从赖若愚到陶鲁笏、卫恒，历任省委第一书记都不承认这个问题。凡不是太行、太岳的干部，都不会被重用，对外来干部则有排斥现象。从赖若愚主政山西（赖以前的山西省委书记先后为程子华、高克林）以来，太行区干部不断提拔到省委、省人委的领导班子中。特别是陶鲁笏担任省委第一书记以后，池必卿、王大任、于林、史纪言等一批有太行区履历的干部于1952年至1956年陆续进入省委常委班子，1956年3月王谦由中共中央机关调任山西省委副书记，进一步增强了原太行区干部的话语权。

文革初期一时甚嚣尘上的所谓袁振问题，就是山头主义、宗派主义的典型例子。其实，袁振在当时的华北局会议上对省委主要负责人提了一些自认为是正确的意见，就被揪住不放，横加批判。从组织程序上讲，袁振此举无可厚非，卫恒等人大可不必那样的兴师问罪。但是，在卫恒等人看来，袁是刚到山西不久的外来干部，又是省委书记处书记兼太原市委第一书记这样一位重量级的人物，加之处于文革这样一个政治上十分敏感的阶段，所以，必须使之服从省委，不能乱说乱动，否则会给卫恒、王谦等人造成极大的被动。殊不知，这种做法反而给他们带来了严重的后果，导致刘格平、袁振等人不堪忍受，起来造反夺权。以致于夺权后不少外来干部和非太行太岳干部，纷纷起来揭发和声讨“山头主义和宗派主义”的罪行。省委这种左的做法，不仅表现在对待袁振和刘格平等人方面，也表现在对待黄克诚态度方面。如1966年省委要求，时任山西省副省长的黄克诚不能参加庆祝国庆16周年的有关活动。

第三，刘格平、刘贯一、陈守中、刘志兰都是以有所谓“错误”而被安排到山西的。

刘格平是1926年加入中共的老党员，长期从事白区工作，先后被国民党当局、日本侵华当局在北平草岚子监狱关押十几年，1944年出狱。全国解放战争时期曾任渤海区党委副书记兼渤海军区副政委。中共建国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此后，担任过统战、民族工作方面的领导职务。1956年中共八大上被选为中央委员。1958年起任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委员会主席。因为在民族工作中与刘少奇、邓小平、李井泉、王震、汪锋等人的意见相左，被指为“犯有地方民族主义错误”，1960年9月入中央党校学习；1965年下放山西任副省长。文革开始后，毛泽东认为刘格平在处理新疆和四川少数民族问题上的做法是对的，其他人是不对的。刘格平虽身为中共八届中央委员，可是连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都未能参加，因此心中有气。刘格平也自认为是“受刘邓司令部迫害”的，自诩正确。特别是在1936年出狱声明问题上，他向中央和毛泽东写的情况说明材料，客观上迎合了毛泽东的政治需要，促成了薄一波等61人的错案。因此，刘格平敢于造反，夺卫恒、王谦等人的领导权。

刘贯一的资历也很老，1926年2月入党，担任过县委书记等重要职务，长期从事中共的联络、情报工作，抗战期间在新四军工作。建国后，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自称同“彭真的错误作过斗争”，“受到彭真的迫害”。1963年到山西任副省长，1965年任省委常委。但他认为“山西省委排斥他”。文革开始后，彭真等人被打成“反党集团”，使刘贯一感到了有了出头之日，同时他认为山西省委同彭真“有黑线关系”，所以当刘格平传达了毛泽东有关山西夺权问题的指示时，他立即响应，游说部分省级领导，鼓动这些人“站出来革命”，并积极参与策划、领导了一·一二夺权。

至于袁振，他在文革初期受的打击最深，不仅被华北局和山西省委指为“野心家”、“伸手派”，而且被罢官。他参与领导一·一二夺权则是顺理成章之事。不仅如此，夺权前他还通过自己的子女插手造反组织和红卫兵，试图以此作为反击卫恒、王谦等省委领导人的筹码。

陈守中也是位老干部，来山西任太原市委书记处书记之前，任中共包头钢铁公司委员会书记。因为他不同意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关于给时任包钢党委副书记、经理杨维的历史问题平反而受到批判，并被调离包钢。对此，王谦曾称：“这样就不好了，没给你们降级处分还不算好！”他和袁振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有共鸣，所以，他给卫恒、王谦、王大任写大字报、参加一·一二夺权可谓是事出有因。

何英才，曾用名杨高梧，是一位山西土生土长的老党员，1926年入党后从事白区工作，坐过牢，1928年就担任山西省委委员。抗战时期活动在太行山上，曾任晋冀豫区党委组织部长，晋豫区党委书记。建国后一直未被重用，到了1965年方担任山西省委常委。他为什么要造反夺权？笔者至今未见详实资料解释原因。但是在一·一二夺权前何英才未被吸纳到核心小组，夺权后也没有让他担任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也未被增补为省核心小组成员，只是刘格平等准备让他任政协主任（主席）。可是不久，因有人揭发他的所谓“叛变”问题而被打倒。

刘志兰作为陈守中的夫人，既因为历史上在北方局同彭德怀夫妇有过密切来往，又因为陈守中的包钢问题受到影响，加之在北京市委党校工作期间和彭真的不同意见之争论，使得她经历了不少的政治风浪。来山西后自然是夫唱妇随。她亦通过自己的女儿与省城的造反组织红联站保持联系。

综上所述，人们可以看出：刘格平、刘贯一、袁振、陈守中、刘志兰之所以造反夺权，是因为他们有所谓“受迫害”的相同遭遇，也因为他们对山西山头主义、宗派主义的严重性感同身受，同时，他们还认为山西省委领导人卫恒、王谦、王大任等“不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而是“刘邓司令部在山西的代理人”，因此必须取而代之，“把党、政、财、文夺过来，让山西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天下！”

但是，山西省的夺权斗争并未到此结束。一·一二夺权的策划者和领导者正如他们自己所说的，要在山西全省展开一场全面的彻底的夺权斗争，特别是要把地委、市委、县委和专署、市人委、县人委的党、政、财、文等大权统统夺过来，成为山西的新主人。我们将另文叙述这一过程。

注 释

〔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2月北京第1版第1470页。

〔2〕人民日报社论：《山西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1967年1月25日第1版。

〔3〕周恩来：接见冶金会议和八一五会议山西代表时的讲话，1969年2月16日。

〔4〕王谦：《省委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79年1月。

〔5〕《中共山西省第四届委员会第二次全体（扩大）会议简报（太原组）—5—》。1979年1月13日。

〔6〕《当代山西大事记》，中国档案出版社1999年8月第1版第348页。

〔7〕《中国共产党山西省组织史资料（1949.10—1987.10）》，山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9月太原第1版〈山西省党组织、党员、干部情况统计表（1949.10—1966.5）〉。

〔8〕赵立法编著：《山西高等教育简史》，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7月第1版第135页。

〔9〕《当代中国农业合作化》编辑室：《建国以来农业合作化史料》，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年第1版第794页。

〔10〕范银环：〈〈大寨之路〉发表之后〉，《党史文汇》1997年第11期第17页。

〔11〕史怀璧：〈要知松高洁，待到雪化时——纪念卫恒同志〉，《卫恒同志纪念文集》，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12月太原第1版第75页。

〔12〕〔13〕《中国共产党山西省组织史资料（1949.10—1987.10）》，山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9月太原第1版第29页。

〔14〕〔15〕陶鲁笱：〈一身正气无私无畏——纪念卫恒同志逝世25周年〉，《卫恒同志纪念文集》，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12月太原第1版第13页。

〔16〕〔17〕〔18〕《中共山西省委关于开展学术批判运动情况的报告》，1966年5月3日。

〔19〕《中共中央通知》（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文件 中发（66）267号，1966年5月19日发出。

〔20〕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6月北京第1版第881页。

〔21〕袁振，一·一二夺权后任中共山西省核心小组成员、山西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

〔22〕〔23〕卢梦：〈回忆那个最黑暗的时刻——我做山西省委文革办主任及以后记述〉，转引自刘建基编著《文革劫难记——山西一·一二夺权前后》。2004年11月太原第766页，山西省内部图书准印证：（02）第220号。

〔24〕卫恒：《在高等院校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1966年6月3日。

〔25〕《中共山西省委关于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安排意见》，1966年7月16日。

〔26〕卫恒：《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积极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1966年7月18日。

〔27〕袁振：《在太原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动员大会上的报告》，1966年7月18日。

〔28〕山西史志研究院编：《中国共产党山西历史纪事1949.10—1976.10》，

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8月北京第1版第400页。

(29)王谦:《他把共产党员的名节视如生命——怀念郑林同志》,《党史文汇》1999年第4期第15页。

(30)《山西日报》,1966年9月19日第1版。

(31)《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人民日报》1966年8月9日第1版。

(32)同(28),第403~404页。

(33)《人民日报》,1966年10月2日第1版。

(34)(35)(36)(37)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6年10月25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1月第1版第143~144页。

(38)师东兵:《这是最后的斗争——记史纪言》,港龙出版社1998年3月第1版第254~255页。

(39)《中共山西省委关于为卫恒同志彻底平反昭雪的决定(1985年6月27日)》,《卫恒纪念文集》第1页。

(4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2月北京第1版第1440页。

(41)(42)(44)王力:《王力反思录(下)》,北星出版社2001年10月第1版第749~751页。

(43)刘格平,中共八届中央委员。一·一二夺权后任中共山西省核心小组组长,山西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北京军区政委,山西省军区第一政委,中共九届中央委员。

(45)(46)刘格平:对山西省委审查结论的书面意见,1983年3月15日。

(47)同(28),第413页。

(48)刘贯一,山西省委常委、副省长。一·一二夺权后任中共山西省核心小组组员、秘书长,山西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省党校校长。

(49)张日清,山西省委常委、山西省军区第二政委。一·一二夺权后任中共山西省核心小组副组长,山西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省无产阶级专政委员会主任,北京军区副政委,中共九届中央候补委员。

(50)何英才,省委常委,省政协党组书记,省政协副主席。一·一二夺权后任山西省革命委员会常委。

(51)陈守中,中共太原市委书记处书记。一·一二夺权后任中共太原市核心小组副组长、组长,太原市革命委员会主任。

(52)刘贯一:《关于刘格平1967年1月6、7日开会的情况》,1973年8月11日。

(53)续纯实,太原市委副书记。一·一二夺权后任中共太原市核心小组组员,太原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

(54)陈守中:《张日清和山西省核心小组的关系》,1973年8月12日。

(55)李玉明:《卫恒最后的二十九天》,转引自刘建基编著《文革劫难——山西一·一二夺权前后》第22页,山西省内部图书印证,(02)字第220号,2004年11月,太原。

(56)《人民日报》,1967年1月12日第1版。

(57)刘志兰,前为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遗孀,后改嫁陈守中。时为省委农村政治部副主任。一·一二夺权后任中共山西省核心小组组员、副秘书长。

(58)丁磊,省人委办公厅信访处干部,刘格平夫人。一·一二夺权后任山西省革命委员会委员,省核心小组解放干部领导小组成员并分管党群口。

(59)中共山西省委党史研究室:《“文化大革命”中山西省“一·一二”篡党夺权事件的专题资料(送审稿)》第121页,1987年8月25日。

(60)杨承效,第十三冶金建设公司工人,山西革命工人造反决死纵队总负责人,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总指挥。一·一二夺权后任山西省革命委员会常委。

〔61〕朱永庚，北京到晋串连的大学生，首都赴晋革命造反大队总负责人，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副总指挥。一·一二夺权后任山西省革命委员会常委，未到职。

〔62〕宋捷，太原工学院学生，山西革命造反兵团主要负责人之一，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副总指挥。一·一二夺权后任山西省革命委员会常委。

〔63〕张建国，山西革命工人造反团总负责人。因对一·一二夺权持不同意见被打成“坏头头”关进监狱，后释放。

〔64〕《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第一号通告》，《山西日报》1967年1月24日第2版。

〔65〕同〔59〕，第55页。

〔66〕孙平：〈回忆郑林在“文革”的日子里〉，转引自刘建基编著：《文革劫难记—1.12夺权前后》第649页，2004年11月，太原。

〔67〕《人民日报》社论：《山西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1967年1月25日第1版。

〔68〕赵雨亭：〈“文化大革命”的十年〉，转引自刘建基编著《文革劫难记—1.12夺权前后》，第678页，2004年11月，太原。

〔69〕陈永贵，中共昔阳县大寨生产大队支部书记。一·一二夺权后任中共山西省核心小组组员，山西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昔阳县革命委员会主任，昔阳县委书记，山西省委书记，晋中地委书记，中共九届中央委员，十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

〔70〕李顺达，中共平顺县西沟生产大队总支书记。一·一二夺权后任山西省革命委员会委员，中共晋东南核心小组组员、平顺县革命委员会主任，中共九届、十届中央委员，平顺县委书记，山西省委常委，晋东南地委书记。

〔71〕解悦，太原纺织厂挡车女工，太原纺织厂红卫队负责人。一·一二夺权后任山西省革命委员会常委。

〔72〕徐志远，中共忻县地委书记。一·一二夺权后任中共山西省核心小组组员，山西省革命委员会常委，中共忻县地区核心小组组长，忻县地区革命委员会主任。

〔73〕稍后，因胡炜率21军移防陕西，中共中央未批准胡炜为中共山西省核心小组组员。中央决定69军调防山西后，1967年2月25日回电山西核心小组：“中央同意中共山西核心小组名单”，“驻军69军的参加核心小组的同志，由你们同军队议定，并报中央和中央军委。”3月，中央批准69军政委曹中南为中共山西核心小组组员。

〔74〕郭永彪，山西省军区副政委。一·一二夺权后任山西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

〔75〕谢振华，陆军第69军副军长。一·一二夺权后任山西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中共山西省核心小组第一副组长，山西省军区司令员，北京军区副司令员，中共山西省委第一书记，山西省革命委员会主任，中共十届中央候补委员。

〔76〕焦国鼎，山西省委常委、山西副省长。一·一二夺权后任山西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

~~~~~

## 【回首文革】

“文革”宣传画 一个时代的“奇葩”

• 朱富贵 •

### ◇ 商业的金手指

1968年7月1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重点发表油画《毛主席去安源》；不到一周，7月7日的《人民日报》发表此画作者刘春华的创作谈《歌颂伟大领袖毛主席是我们最大的幸福》；事隔一天，7月9日的《人民日报》发表新华社记者长篇报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出灿烂的艺术之花——记大幅油画〈毛主席去安源〉的诞生》。到了10月份，北京市美术装



潢包装工业公司印制的《毛主席去安源》印刷像开始供应。被两份重要的报纸推出，意味着此画已成为当时最重要的宣传性作品。

这幅“文革”宣传画预示着政治事件的风起云涌，它于1967年创作时就引起了政治层面的论争，有人指责：既然毛主席是去工人之中，画面上怎么只有孤零零的一个形象，人民群众哪里去了？并且画面上满天乌云，有隐喻毛主席来了就暗无天日的嫌疑。而作者刘春华这样回答：只画主席一人就是没有群众观点？画群众就有群众观点？那画多少人才有群众观点？主席正向群众走来，还没有走到呢，毛主席来了拨开乌云。有首民谣唱道：直到1921年，忽然雾散见青天，有个能人毛润芝，打从湘南来安源……

1967年10月，“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亮了安源工人运动”展览在北京展出，刘春华算是一展成名，再经过一系列频繁的政治性展览的露面，《毛主席去安源》终于成了宣传画中红得不可思议的巨作，前后发行量达九亿张之巨，也是全世界迄今为止发行量最大的美术作品。

时光荏苒，一张充满了政治符号的艺术作品进入商业时代之后，被商业点石成金的手指转化成了货币符号。1999年，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将该画拍卖，拍出了550万元人民币的天价，作者刘春华个人获利396万元。当然，一系列关于此画的作者、归属权等等的官司也接着如火如荼地开打。

政治开头，商业结局，事情往往如此。与《毛主席去安源》类似，近年来“文革”时期宣传画的大型拍卖与坊间交易正处于上升阶段，宣传画以一路狂飚的速度升值。再也没有人从政治的角度去对待这些画，它们只是意味着投资、暴富，商业视角取代了政治视角。当年价值几分钱的宣传画，如今要以数百到数万元的价格才能买到。相比之下国内的文革宣传画比国外更低价，近年来上海、北京、广州等地虽然交易频繁，但价格只相当于国外的几分之一。究其原因，国内的收藏、炒卖热潮当初由国外人士所带动，西方收藏与研究、炒卖文革宣传画的历史早在上个世纪70年代即已开始。据媒体报道，荷兰莱顿大学的教授斯特凡·兰茨贝里耶从1970年代就有意识地收藏中国宣传画，他遍访欧洲的左派书店，为求一画甚至向当时中国的“国际书店”邮购，如今，兰茨贝里耶已成了中国宣传画最大的海外收藏家。

拍卖“文革”宣传画的海内外网站多不胜数，只要与艺术品交易有关的网站都在卖“文革”宣传画，甚至许多人不断造假，《毛主席接见红卫兵》、《一定要解放台湾》、《抗美援朝》一直是假冒的热点与重点。美国的巴特尔古籍书刊公司一直在网站上出售文革宣传画，香港的中文书库网站也在大批量地售出“文革”宣传画。

商业的金手指正在拂去这些画中已逝时代的政治意味，将它们点化为商业中的宠儿。

#### ◇ 宣传画的前世今生

要说到“文革”宣传画，先有必要对中国宣传画做一番追本溯源。

最早的宣传画大约出现在上世纪30年代，为抗日战服务，鼓舞抗日情绪，以鼓动性与战斗性为价值标准，主题鲜明、形象夸张、情绪激昂，只讲实用功能，不论艺术性。

对早期中国宣传画影响最大的国家是苏联。1951年4月3日，北京举行的“苏联宣传画和讽刺画展览会”，是建国后对苏联艺术较早的一次大型展览，对此后的中国宣传画有着莫大的影响；1954年朝花美术出版社推出苏联理论家维·依凡诺夫等写作的艺术理论书籍《谈政治宣传画》，在当时从理论上影响了中国的宣传画创作。与苏联类似，东欧共产主义国家的艺

术形式也对中国的宣传画有着影响，1957年4月，北京举办了“波兰宣传画和书籍插图展览”。这些外来艺术立刻被当时十分缺乏理论引导的中国宣传画模仿并达到一个质的高度：改变了延安时期的简陋风格，在注重政治意图的同时也加强了艺术性。20世纪50年代历次的全国美展上，宣传画都作为一个艺术门类参加了展出，在整个50年代，宣传画渐渐地红了起来。

但真正形成“中国特色”的宣传画，则要等到60年代，尤其是“文革”开始之后。1966年2月19日到2月23日，全国美协分会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此后，在美术种类中，宣传画成为最重要的艺术形式，并代表着政治高度。到了1966年底，各类纯艺术种类已被打压下去，宣传画形式更加大好；11月份江青接见中央美术学院教师及红卫兵时如是说：“齐白石的画，我已经注意了好几年。那是什么画？为什么要搞那么大的画册？是谁把齐白石封为当代的‘艺术大师？’”“听说你们学校，西洋的资产阶级艺术流行，为什么美术学院西方现代艺术泛滥呢？那是政治思想工作的問題。”“我们要创造世界上第一流的最新最好的艺术。”什么是江青认为的“世界上第一流的最新最好艺术”呢？无疑就是革命宣传画。

为了明哲保身或者大捞政治资本，不少画家涌向宣传画的领域，这些专业美术工作者的参与，使得宣传画的艺术水平不断上升。20世纪60年代，宣传画进入高速发展期，成为所有美术种类中唯独得以红遍全国山河的视觉艺术，不仅整体水平迅速提高，还出现了一批既有民族风格又有时代特色的作品。

那个年代创作宣传画所用的材料都是国产的纸张和颜料，质量很差。宣传画创作伊始都必须经领导审查同意再出版发行，原作放置不久就坏掉，只有作为印刷品的画才能最直接保持原有的艺术气氛。当时，大部分人没有条件看电视或去美术馆看原作展览，只有通过张贴在街头、车间、教室、军营、村庄等的宣传画，或者花上几分钱、几毛钱买回家中贴在墙上，才得以欣赏这种在当时最普遍、最流行视觉艺术。

#### ◇ 60年代宣传画的关键词：毛泽东

20世纪整个60年代的宣传画，尤其是“文革”时期的宣传画，基本都是人物画，而最重要最基本的人物形象是“毛泽东”；即使从作品的隐喻层来说，唯一要表现的人物形象也是“毛泽东”。

在《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一图中，挥手的毛泽东为近景，其高大形象占据画面的三分之一，工农兵是中景，蓝天白云是远景；《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倒美帝，打倒苏修，打倒各国反动派》一图中，毛泽东形象放在太阳光升起的东方，高大并充满光芒，从画面比例来讲，与图中所有背景人物加起来差不多。《对伟大导师心怀一个‘忠’字，对伟大毛泽东思想狠抓一个‘用’字》一图中，毛泽东处在一片红海洋中，身上万丈金光，因为要突出毛泽东的伟大，在构图上已经不再顾及艺术的透视原则。《毛主席是全世界革命人民心中最红最红的太阳》一图中，毛泽东干脆被处理成与红太阳巨大地重叠在一起的形象，其形象之大与底部人民形象之小，已经严重违背了艺术的构图规律。在关于革命主题的图面中，毛泽东一直被处理在“太阳”的位置，“毛泽东”与“太阳”的同义在这个时期的宣传画中最完整地重合在了一起。

在并不直接出现毛泽东形象的宣传画里，“毛泽东”仍然作为一个被暗示的母题存在，《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图中，两个穿着军装的青年从车窗里探出头来，手持红宝书，身上别着金色的毛泽东像章，毛泽东的形象虽然没有直接出现，但却以暗示的方式让其无所不在。值得一说的是，为表现“奔赴”农村边疆的毛泽东教导，列车在风驰电掣中车窗大开，无数的红宝书从车内伸出来，而两个主要人物的大半个身子已经伸出了车外，也许是那个太革命的时代里物理定律不起作用了，所以两人没有发生任何危险，脸上堆满笑容。而

在《无产阶级专政万岁》中，工农兵手托厚实的红宝书，胸别毛泽东像章，仍然暗示出毛泽东形象的在场。就算在以江青为主要人物形象的宣传画中，毛泽东仍然在场，从江青手中的红宝书上，从她胸前的像章上。“红宝书”、“像章”、“语录”成了暗示毛泽东影响与权威的三个主要元素。

在这些作品中，毛泽东的脸部通常用暖色调处理，人像显得光泽润滑，产生向外辐射的光源效果，“照亮了”画面中注视着领袖的那些脸庞。“领袖的面孔比设计宣传画的目的更重要：在许多情况下，一样的领袖头像印制于不同年份，为了用于不同的宣传事业而配上不同的宣传口号”，《中国宣传画》一书如是说。毛泽东的头像一直是以毛为主体的宣传画的重点所在，刘春华在创作《毛主席去安源》的过程中，重点一直是放在毛泽东的头像上，为琢磨毛的表情与神态，用了很长时间去参照青年毛泽东的照片，一张张地临摹，又收集了毛泽东各个时期一直到“文化大革命”中的照片，不断琢磨和研究。

在整个“文革”时期的宣传画中，被拍出高价者很大一部份是以毛泽东为主体的作品，《毛主席去安源》不用说，迄今为止海外“文革”宣传画拍卖最高价位，约人民币25万元的那一幅，画面还是正在挥手的毛泽东，下面是红卫兵。《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万岁》被2001年苏富比拍至1035美元，《紧跟毛主席在大风大浪中锻炼成长》标价220美元，毛在西方世界的眼中一直是让他们好奇的形象。而西方的评论家们也认为：革命领袖几乎成为当时宣传画唯一的主题。据西方收藏家统计，含有毛泽东肖像的宣传画在“文革”时期仅官方就大约印制了22亿幅，意味着中国当时大约人手3张。

#### ◇ 被提前后的现代艺术

“文革”宣传画在商业时代重新走红，尤其被西方收藏家所钟爱，商业只是一半的原因，另一半原因在于它的艺术特征。当时整个中国的艺术一直停滞不前，但宣传画却因为政治需求而提前跨入“后现代主义”阶段。2005年4月30日至5月29日，由广东美术馆主办，多家媒体、出版社、网络协办的“毛泽东时代美术（1942—1976）文献展”在广东美术馆展出，有近300件作品以及相关的文献资料参展。本次大展的策展人之一、中央美术学院的邹跃进教授在其所著的《新中国美术史》一书中，提出了“毛时代的美术（1942—1976）”这一美术史概念。而据南方日报载，广州美院的李公明教授则认为“毛时代美术”提供了“一个研究意识形态与艺术如何结合的完美样本”。认为这些作品暗合了后现代的模式，即对权威、单一深度模式的拆解与反讽，对艺术规则破坏与重建。而在美学上，它创造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审美潮流，对健康、劳动、力量的赞美，诸如灿烂的阳光、青春健康的青年男女，不但是当时青年们心态的一种真实反映，也符合人性中永恒的审美需求。断裂性、一次性、复制性……这些后现代艺术的因素在当时的作品中几乎都能找到。而这些当时走红的作品，几乎都被印刷成了宣传画。

以画驴和骆驼见长的画家祁峰，在上世纪60年代以一副题为《雨夜出诊》的宣传画成名，他分析了“文革”宣传画为什么具有很高的收藏价值，“主要是因为‘文革’宣传画特色太鲜明，比如《大力支援农业》宣传画，画面为一右手高举《毛主席语录》的农民的高大形象，红、光、亮、高、大、全，时代特征强烈。”

从社会的层面来分析，“文革”宣传画具有这些特征：一是没有名利思想和商品气息。因为几乎所有的画家都把创作当作政治任务来看待，创作态度严谨小心，而作者一般不会署上自己的名字，往往签集体或单位之名。二是每张画都烙上了时代的鲜明印记。尤其是“文革”前五年的宣传画，“万岁不离口、语录不离手”，所有语录与政治形势都能在画中找到。三是具有极强视觉冲击力和感召力。色彩的“红光亮”和形象的“高大全”体现在所有画面中，诸如《光

辉的榜样、伟大的创举》，描绘毛泽东乘车第8次检阅红卫兵。四是发行数量巨大但现存量稀少。虽然每种画的印数蔚为壮观，但当时大众没有收藏意识，而很多张贴过的都被毁掉，是以今天存量已不多。

而从艺术的层面来看，“文革”宣传画虽然构图不符合既有艺术规则、单调、粗糙，但却具备强烈的只有那个时代才出现的艺术特征，比如工农兵形象的高大健壮，脸部永远宽阔红红润，眼神永远充满了希望与信心，手臂永远粗壮有力，姿势永远是冲锋向前的预备。而许多作者的想象力不逊于大跃进时期对粮食产量的狂想，诸如《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照亮了革命舞台》中，毛泽东被移植到了太阳中心。《蒸蒸日上》中钢炉就象宇宙飞船一样充满了动感与气势，《沿着毛主席革命路线继续前进》中，红旗都刺破了天空。虽然许多无名的画家们不一定看过知道毕加索、梵高，但人人笔下都充满了夸张与强烈的激情。

从“文革”走过来的人们对宣传画的印象更多地是停留在政治运动的回忆上，而后“文革”时代的艺术家们则把“文革”宣传画看作一种政治波普艺术。而这些画符合西方对中国的想象，尤其是对毛时代的想象，在西方的想象中，毛时代就是如此地激情，打破了理性限制和人与人之间的亲密无间，所以虽然在大陆这些画只是商业上的财富符号，但在西方的视野中它却成了一朵“中国化”、“本土化”、“后现代”的艺术奇葩。

□ 《青年作家》 2006年第2期

---

|         |             |          |
|---------|-------------|----------|
| 本期编辑：   |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 《CND》总编： |
| 丁凯文（美国） | 思语（美国）      | 陈天寒（美国）  |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邮箱：[tougao@cnd.org](mailto: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mailto: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wxz-info@cnd.org](mailto:hwx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mailto: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cnd.org/>

---